

# “文革”的预演

## ——“四清”运动始末

林小波 郭德宏 著

 人民出版社

# “文革”的预演

## ——“四清”运动始末

林小波 郭德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革”的预演:“四清”运动始末/林小波,郭德宏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319-6

I. ①文… II. ①林… ②郭 III. 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中国

IV. ①D6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977 号

“文革”的预演

WENGE DE YUYAN

——“四清”运动始末

林小波 郭德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278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01-012319-6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第一章 “四清”的起源 /1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刘少奇等人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曾当面斥责刘少奇，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党内高层的意见分歧以及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
- 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5
- 三、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15

## 第二章 发动和试点 /23

虽然毛泽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但由于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大多数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

中央对“四清”运动的部署还是相当谨慎的，一再强调运动不要急，要试点，要分期分批。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找蚂蚁。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打无把握之仗。但是，各地在运动中都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

- 一、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与“前十条” /23
- 二、“五反”试点 /35
- 三、农村“四清”试点 /43
- 四、“后十条” /50

### 第三章 “四清”全面铺开 /59

1964年2月,毛泽东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做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挖修根”,而经过一年多的运动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地富反坏分子猖狂活动;基层干部贪污腐化、多吃多占;党内高层又出现修正主义,这一切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搞“四清”运动的决心,而且必须进行到底、要打“歼灭战”。

- 一、“双十条”宣讲 /59
- 二、继续“五反” /65
- 三、“四清”全面铺开 /73
- 四、毛泽东谈“四清” /75

### 第四章 刘少奇与“四清” /85

刘少奇提出要在运动中摧垮“反革命两面政权”,搞比土地改革更深入的革命运动。这使田家英感到很难,因为要按照自己没有想通的意见去写,自然十分吃力,难以落笔。

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多次强调“挖根子”,上面的根子也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因为上面的根子更危险。

- 一、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 /85
- 二、刘少奇视察“四清”运动 /96
- 三、“后十条”修正案 /105

### 第五章 “四清”样板 /113

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64年9月1日,中央批转了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对“四清”运动开展具有指导作用的“桃园经验”。

工作组认为,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国民党的事”、“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然而,直到工作组离开,也没有查出吴臣和国民党或特务组织有任何联系。

一、“白银厂经验”/113

二、“桃园经验”/119

三、“小站经验”/126

## 第六章 “大兵团作战”/138

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中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强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获取第一手材料。

不少人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认为许多单位已经烂掉了,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各重点县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基层组织 and 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过火斗争,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自杀等极端现象。

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38

二、检查和反对右倾思想/145

三、领导干部蹲点,指导“四清”/149

四、练兵练将,整训工作队/154

五、夺权斗争/162

## 第七章 “四清”的转折/169

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据曾志回忆,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

随着运动的开展,作为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许多做法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逐渐把“挖修根”的视线转移到中央上层。对工作中问题的不同看法,再加上其他复杂的个人因素,两位领导人也逐步由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冲突。

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严重分歧 /169

二、“二十三条” /179

三、“大四清” /197

## 第八章 尾 声 /217

“四清”后期，逐渐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到1965年下半年，由于国内外形势日益紧张，毛泽东对这场运动已不太感兴趣了。

历史是无情的，“四清”过后，一场所谓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而把中华民族拖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大动荡。

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217

二、“四清”纳入“文革” /227

三、“四清”运动的历史评价 /235

四、思考与启示 /246

## 附录：“四清”运动大事记 /251

## 第一章 “四清”的起源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刘少奇等人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曾当面斥责刘少奇，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党内高层的意见分歧以及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sup>①</sup>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刚从几千年传统小农经济生活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几乎每年都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成为“四清”运动的预演。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说：“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sup>①</sup>他并且要求:“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做法是“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于8月8日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就合作社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举行大辩论。

1958年,在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中,8月29日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三年来‘马鞍形’的历史教训,彻底批判‘靠天吃饭’的‘条件论’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惯论’,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而且在思想上彻底破产。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sup>②</sup>。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中央又一次提出在农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湖南省委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批示中说:“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并说近几个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页。

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领导上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sup>①</sup>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sup>②</sup>。196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结合秋季分配、秋季征购、冬季生产、整风整社和春耕生产准备工作,针对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间还存在的思想问题,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同时,《指示》也指出:“不断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没有这项工作,很多农民就会迷失方向,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sup>③</sup>

在整风整社运动初期,各地为贯彻毛泽东“旧账一般要算”的指示,普遍开展了算账的运动。算账过程中,各地普遍清查了1958年的分配账、粮食账、食堂账、副业收入账以及种子调拨账等。有的地方不仅提出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思想作风账。如江苏省江宁县东山人民公社在开算账大会时认为,经济账来源于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因此在清算经济账的同时,必须下决心清算一下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算账运动的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整风运动。<sup>④</sup>中央认为:“江苏提出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思想作风账,这一点很重要。不弄通思想作风,要算好经济账是不容易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58—25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673—674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5—771页。

④ 《中共江宁县县委关于东山人民公社算账大会情况的第一次报告》(1959年4月12日)。

的。”算账运动中也发生了过“左”的错误，如陕西汉中地委在算账中发生两起自杀事件。一起是马道公社办公室主任兼会计张永其，算账时自认贪污70多元，据检查有80多元，公社领导错误采用了轮流谈话的方法，引起恐惧，致其上吊自杀。另一起是铺镇公社九女管理区女社员牛洪玉，因婆婆检举她偷过一斗谷子，干部把她叫到群众大会上坦白，她见苗头不对，借口回家看娃，用刀子自刎。因此，从算账的基本内容和后果看，它实际上已具备后期经济“四清”的雏形。

在随后的整风整社过程中，各地在步骤上，大致采取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鸣放辩论，回忆对比，分清大是大非，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问题。第二，选择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代表人物进行重点批判。第三，整顿干部队伍，进行党、团组织建设。第四，制定生产计划，组织生产高潮。在整社的基本要求上，有的地方提出从思想、政治、组织和制度上巩固人民公社。如湖南省委在整社试点时，提出在思想上，要把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的错误言行，在群众中狠狠搞臭，划清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在政治上，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培养和扩大骨干力量，树立三部分人在生产队和作业组的绝对优势，把领导权紧紧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在组织上，把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各级组织都健全起来；在制度上，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生活管理、财物、分配和民主管理制度。在整社的基本方法上，有的地方，如河北保定采取了“四清”的做法，即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以期达到堵塞经济漏洞、加强经营管理、整顿干部作风、促进劳动生产的目的。同时，全国不少地方也在搞“三清”、“五清”、“六清”等，做法不一，但不论叫几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sup>①</sup>。

由此可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已经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基本形成，其运动中产生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与“四清”时期类似。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实际上就是“四清”运动的预演和准备，只不过由于正在进行经济调整等条件的限制，运动没有演变成像“四清”时期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因此，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国内，因“三面红旗”而在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分歧，在国外，鉴于苏联已经“变修”和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使毛

<sup>①</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从而在全国再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 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同时,对造成困难原因的分析上,认为是基层干部作风存在问题。可以说,党内高层的意见分歧以及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面对国内严重的局势,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问题;三是干部的甄别平反问题。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sup>①</sup>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30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

<sup>①</sup> 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sup>①</sup>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sup>②</sup>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组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551、530页。

<sup>②</sup> 王光美、刘源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sup>①</sup>作为党内为数不多的懂经济、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前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他评价了刚刚结束的七千人大会,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sup>②</sup>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sup>③</sup>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sup>④</sup>,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sup>⑤</sup>。要求在宣讲大好形势时,“要有一段长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sup>⑥</sup>。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637、638、650、659、660、6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106页。

③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91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7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sup>①</sup>。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sup>②</sup>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sup>③</sup>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sup>④</sup>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sup>⑤</sup>。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主席曾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sup>⑥</sup>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sup>⑦</sup>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

①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4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364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页。

④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294、56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40页。

⑥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7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555页。

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sup>①</sup>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做“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sup>②</sup>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sup>③</sup>。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几起几落。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产生许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但在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庐山会议后，再次遭到批判，认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

① 王光美、刘源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9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8、1110页。

③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605—606页。



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sup>①</sup>。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sup>②</sup>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sup>③</sup>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sup>④</sup> 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产到户,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4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做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248—253页。

② 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6—90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页。

④ 《陈云年谱》(下卷),第115、119页。